

試論人生佛教的兩個弘化典型

——印光與太虛（一）

本文榮獲九十五學年度周海德居士獎學金

● 吳孟謙

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

一、前言

近現代的中國，經歷了一段風起雲湧、波浪濤天的歷史，西方文明的強烈撞擊，讓沉浸在天朝美夢的中國人甦醒過來，也使得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等各層面的內部問題一一浮上檯面，檢討傳統與謀求生存的強烈意識，在知識分子心中不斷蔓延，即使是超然於世的佛教，也無法自外於此一時代巨變，而必須重新反省自身的價值與出路。

近代以來，中國佛教自身出現了許多流弊，包括義學空疏、

態度消極、制度腐化等，遂在清末以來歷史環境的挑戰與危機中，逼出佛教界眾多的高僧與居士。人才的輩出，使民國以來的中國佛教呈現了復興之象，而其中影響力最深最廣者，當屬印光（1861-1940）與太虛（1889-1947）二大師。當時積極投入中國佛教改革運動的大醒法師（1900-1952）即曾明言：「在近二十年中的中國佛教界，能尊稱為第一流高僧的僧侶，首推印光大師與太虛大師。雖然在這二十年之間，中國第一流的高僧，過去有諦閑法師，現在有弘一法



師、虛雲和尚、興慈法師、仁山法師等，但引起全國佛教徒信仰之心的，祇有印、太二老。這個事實，一者可以二老的皈依徒眾之數量斷定，二者可以二老對於中國佛教的實際貢獻證實。」印光與太虛的一大共通點，乃是把握傳統中國佛教的精神，在其自身有修有證的基礎上，廣泛地弘揚切合人生現實之所需的佛法。故「人生佛教」一詞，雖為太虛所特創，但就廣義而言，實可同時涵蓋二人的思想精神；而在此共通的精神下，兩人又就其各自之關懷與見地，樹立了風格相異的弘化典型。若能就二大師的弘化典型加以探討比較，對於未來中國佛教的發展，將具有提供省思與啟導價值的重要意義。

本文將試圖從「弘化宗旨」、「弘化特色」與「弘化方法」等三個層面，分別闡述並比較印光與太虛的弘化典型，並在此基礎上，進一步思考中國佛教當前的課題與未來的方向，以彌補過去相關研究的不足。

二、弘化宗旨：敦倫盡分與即人成佛

清中葉以來，中國佛教內部的解行工夫，都有衰弛的現象，相對而言，導民化俗的正面功能也逐漸削弱。僧人們不是消極地避居山林，就是以經懺事業牟利維生，佛教的形象遂漸漸被定為封閉的、消極的、鬼神的或迷信的。面對此一情況，印光積極地強調佛法不離世法而以世法為基礎的精神，他說：

學佛一事，原須克盡人道，方可趣向。…良以佛教該世出世間一切諸法。故于父言慈，于子言孝，各令盡其人道之分，然後修出世之法。譬如欲修萬丈高樓，必先堅築地基，開通水道，則萬丈高樓方可增修，且可永久不壞；若或地基不堅，必至未成而壞。

正因學佛與為人密不可分，

所以印光十分重視傳統儒家的倫常，務使佛法的精神結合儒家倫理，落實在日用常行中，他說：

欲為真佛，須先從能為真儒始。若於正心誠意、克己復禮、主敬存誠、孝友弟恭等，不能操持敦篤，則根基不固，何以學佛？

此外，印光畢生反對人出家，亦不收出家徒眾。此一方面是有鑑於當時大環境惡劣，欺僧奪產之事頻繁，出家修行不如居家有益；再則若未能取得親人諒解，反易使人毀謗佛法、墮落惡道；三則因出家實屬大丈夫之事，必須能住持道場、續佛慧命，故不能不慎重考慮。重視在家修行的傾向，自然也使得印光的思想同步重視世間倫理，強化了佛教的普世性。

印光是淨土法門的弘揚者，故他除了說明佛法與世間倫理的關係，更時時闡發淨土行者應有的人生態度，以及念佛法門所具

有的人生意義，他說：

念佛最要緊是敦倫盡分、閑邪存誠、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。存好心，說好話，行好事。

又說：

不計他對我之盡分與否，我總要盡我之分。能於家庭，及與社會，盡誼盡分，是名善人。善人念佛求生西方，決定臨終，即得往生。以其心與佛合，故感佛慈接引也。

一般人總認為淨土法門是以一句佛號渴求生西，而於現世放棄努力，無所作為。印光的觀點則是闡明念佛人要能往生西方，重要的是「心與佛合」方能感應，而一個以佛心為己心的人，自當積極的活在當下，善盡自己為人的一切義分。他說：



直須將一死字（此字好得很）挂到額顱上。凡不宜貪戀之境現前，則知此吾之鑊湯鑪炭也，則斷不至如飛蛾赴火，自取燒身矣！凡分所應為之事，則知此吾之出苦慈航也，則斷不至當仁固讓，見義不為矣！如是則塵境即可作入道之緣，豈必屏絕塵緣，方堪修道乎？…人生世間，不可無所作為，但自盡誼盡分，決不於誼分之外，有所覬覦。士農工商，各務其業，以為養身養家之本，隨分隨力執持佛號，決志求生。

此處，印光以一種「生死對揚」的方式，既揭示出人生應當善盡本分，積極有為；也同時本於淨土宗的宗旨，提醒人應當念死無常，不可貪戀執著本分以外之事業，而仍須以求生西方、速成佛道為終極關懷。與一般勸善利世的世間學說或宗教相較，印光為佛法標示出其特有的「入

世而不戀世、出世而不厭世」的人生態度與生死學高度。而淨土宗的殊勝更在於它的修持簡易平實，不求當生斷惑了生死，故「一切世間事務，均無所礙」，處在任何的身分地位，皆可修行（另詳下文）。同時它不僅不叫人放棄在此一世間的各項義務與責任，反而因為在心靈上擁有佛力的憑仗與淨土的依怙，使人們能夠更精勤的在此世間為善去惡，奉獻生命。陳兵與鄧子美的《二十世紀中國佛教》一書中，詳細敘述了淨土信仰者在二十世紀中無與倫比的社會貢獻，並言：「整個20世紀，哪裡佛教界對社會貢獻大，哪裡的佛教公益、文化教育事業發達，哪裡就高懸著淨土信仰的指引，閃動著淨土宗人的身影。」由此成效可知，印光從淨土法門來提倡「敦倫盡分」的積極人生，確有其非眾可窺及的慧識與卓見。

印光本人並未提出「人生佛教」之名，此乃太虛所首倡。在《太虛全書》中，有關人生佛教

的文章共有42篇，足見其倡導人生佛教的不遺餘力。太虛曾經引述當時著名學人梁漱溟在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》中的一段批評並加以回應：

「似乎記得太虛和尚在《海潮音》一文中藉著『人天乘』的一句話為題目，替佛教擴張他的範圍到現世生活裏來。…其實這個改造是作不到的事，如果作到也必非復佛教。」我（太虛）要發揮佛教原來直接佛法的人乘法，以施行到現在人世的生活裡來，可謂一語道著。然我發生此願望之動機，全不是替佛教擴張他的範圍，以為此原為佛教範圍內的事。

梁漱溟本虔誠學佛，後來則從佛家轉入儒家，其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》一書在當時極受矚目，故其質疑對太虛具有直接的刺激與影響。太虛對人生佛教的積極提倡，目的在於發揚佛學

中積極入世的精神，以消除一般人對於佛法無益於現實社會的負面評價。他積極吸納當時流行的思潮與學說，用新式的語彙重新詮釋佛法，其重點也是為了開演佛學的現實意義，加強學界與社會大眾對佛教的認同感。

太虛曾言：「眾苦方沸騰，遍救懷明達，仰止唯佛陀，完就在人格，人圓佛即成，是名真現實」，認為末法期眾生應「直依人生增進成佛」、「發達人生進化成佛」，故提倡所謂「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」。也即以人天善行為基礎，進趨於大乘菩薩道與究竟佛果，希望以此為世間提供一條趨向至善的道路。他說：

於現代交通的互助的人類底共存共榮關係上，於東西各民族的人生哲學基礎上，以大乘初步的十善行佛學，先完成人生應有的善行，開展為有組織有紀律的大乘社會生活。再漸從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的佛學，發達



人生中潛有的德能。重重進化，以至於圓滿福慧的無上正覺。

可見太虛不僅強調佛法之於現實人生的價值，更希望運用佛法來造就人間淨土。民國十五年，他即提出〈建設人間淨土論〉，民國十七年，又仿三民主義而提出「三佛主義」，欲建立一個普遍佛化、時豐物阜的安樂國土。這種改造世界的宏願與烏托邦式的理想，是他從年輕時代就發起的，而此種思想，太虛曾自承頗受到當時國內外學人的改革思潮之影響，包括康有為的《大同書》、譚嗣同的《仁學》、嚴復所譯的《天演論》與《群學肄言》，以及孫中山、章太炎、梁啟超，乃至托爾斯泰、克魯泡特金等人的思想。正因如此，其學說主張就與這些學人一樣，皆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、理想主義色彩，而不免忽略其付諸實行的各種現實困難。雖然如此，太虛身先士卒地推動佛教改

革（詳下文），回應時代課題，確實為當時死氣沉沉、消極保守的佛教，注入了滾滾源泉。

綜上而言，印光與太虛的弘化宗旨皆注重佛法與人生的聯結。印光結合儒家倫理，教人建立敦倫盡分的人生態度，並同時「生死對揚」地標立出求生西方的終極目標，從而使佛教在積極導向世間的同時，仍保有念死無常、無執無貪的超越性；太虛的入世傾向則較印光更為濃厚，他從以佛教改造世界的悲願出發，教人秉持即人成佛的菩薩道精神，全面投入人間淨土的經營與建設。對於現實社會的種種問題，太虛可說比印光更為積極務實；然而回到佛法本身，太虛即人成佛與人間淨土的理論，或多或少減損了佛教的出離性格。就煩惱具足、生死未了的凡夫而言，不免過度理想化，反不如印光的敦倫盡分、念佛生西來得切實可把握了！⁹（待續）